

从《长辈的故事》到《翠湖》

——两代“80后”对话昆明记忆

本报记者 吴沛莉



本报美编 张维麟 制图

昆明的故事，一半在滇池的浪里，一半在翠湖的波中；昆明的记忆，一半藏在“八零后”的老照片里，一半映在80后的银幕上。两代人眼中的昆明，究竟藏着怎样不同的时光印记？滇池的百年风云，又如何与翠湖边的家庭故事交织共鸣？10月12日，“两位‘80后’书写昆明故事”交流分享会在昆明璞玉书店举办，《长辈的故事》作者熊景明、《翠湖》导演卞灼，云南大学袁长庚副教授齐聚一堂，展开一场关于家庭、城市与历史记忆的跨时空对话。

家庭叙事 连接个体与历史的时间纽带

交流的第一个主题围绕个体记忆展开。当年逾八旬的熊景明将《长辈的故事》中1909年的家族老照片展现在观众面前时，她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写家史、口述史，是把时间拖回来一点的唯一方式。”在她看来，家庭叙事绝非私人记忆的琐碎记录，而是理解社会史的“最小单元”。她提到北大历史系新生的第一份作业就是写家史，印证了“不懂家庭史，便难懂社会史”的逻辑。在她的创作中，其实并未预设中心思想或明确主题，而是通过记录十余位长辈真实而细微的经历，但这些点滴，以及百余张老照片里从长袍马褂到中山装的服饰变迁，实则正是20世纪昆明社会变迁的微观切片。

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逻辑，在80后导演卞灼的《翠湖》中以影像形式延续。为了贴近“生活实感”，他刻意弱化戏剧性，模糊时代背景，原本设定在20年前的故事，因小成本无法还原旧场景而淡化时间标记，却意外让观众跳出“时代错位”的纠结，直抵家庭情感的核心。“强戏剧性让观众站在外面看，弱戏剧性才

能让他们走进故事里。”卞灼解释。影片中翠湖边三代人的沉默、试探与牵挂，虽聚焦个体家庭，却折射出当代人“寻根无门”的集体困境，正如他自己年少时离开昆明后，辗转多地仍找不到“具象归处”的迷茫，恰是城市化进程中无数小家庭的缩影。

主持人袁长庚则从人类学视角明确了这种叙事的价值。他提到云南历史的“折壹性”：“看似简单的昆明家庭故事，背后藏着近代史的多重量交织。”熊景明的家族史记录百年风云，卞灼的电影捕捉当下情感褶皱，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家庭情感地图”。在他看来，家庭叙事的本质是“对抗遗忘”，当观众从《长辈的故事》里想起外婆的口头禅，从《翠湖》中看到自家饭桌上的沉默时，个体记忆便与集体历史产生了共振。

代际冲突 不是“恶意对抗”而是“认知错位”

交流会上，“代际关系”成为最易引发共鸣的话题，而三位讲述者的共识是：当下的代际冲突，根源并非“父母不爱”或“子女不孝”，而是时代变迁中的“认知错位”与“经验鸿沟”。

熊景明以自身成长经历为参照，勾勒出传统家庭的“松驰感”。幼时父母对自己学习成绩没有过高要求，更关心自己的健康状况。“母亲常说‘100分能当饭吃吗？’父亲甚至曾在别人调查户口时，记错我就读的年级”。在这种“不必强求考第一”的家庭氛围中，她甚至在被父亲用勺子“吓”，敢捡勺打回去。这种“不分老幼的平等”，让她在研究三代妇女代际关系时发现“我们与母亲的关系，远好于一代代”。她将差异归因于“期待的变化”：父母那代受儒家教育即无“精英期待”；而现代父母的“爱”常与“控制”捆

绑，本质是将“现代育儿理念”变成了新的“控制工具”。

卞灼的经历则暴露了现代家庭的“边界缺失”。他回忆母亲曾偷看自己日记，侵入私生活，直到现在仍试图干预他的生活。这种“以爱为名的越界”，在《翠湖》中被转化为“长辈过度关心小辈婚恋”的剧情，引发部分观众吐槽。但他并不认同“原生家庭破碎论”：“很多问题不是家庭生来破碎，而是过度关心异化成了控制。”就像影片结局“大梦一场，冲突未解决却未决裂”，他认为这才是真实的家庭状态——没有激烈和解，只有默默包容。

袁长庚则用“时代局限”为冲突提供了更宏观的解释。他举了曾在深圳任教时的例子：母亲用儿子邮箱发求助信，只因“不知道现代家庭该如何相处”。“父母那代人多来自农村大家庭，没见过‘小家庭的边界’，他们的控制不是恶意，是‘没学过更好的方式’。”他引用美国学者的研究直言：“所有人当父母时，都潜意识期待孩子复制自己的人生，但孩子本是陌生人。”这种“复制期待”与“个体独立”的矛盾，正是代际冲突的核心。

家庭未来 不拒多元，不失内核

当讨论转向“家庭文化的未来”时，三位讲述者虽视角不同，却达成了“不拒多元，不失内核”的共识：家庭形态可以变，但“情感联结”的核心不能丢。

熊景明对未来不做预判，却强调“不能把传统的好东西丢掉”。她曾在朋友家目睹孙子拒绝外婆的教育：“不要给我感恩教育”，这让她警惕“批判传统时，把婴儿和脏水一起倒掉”。在她看来，“感恩”是家庭的核心品德，“松驰”是家庭的相处智慧，无论未来家庭形式如何变，这两

种内核不能失。她不反对个人主义，却希望“在个人与家庭间找平衡”，比如女儿17岁去美国后受个人主义影响，虽与她的关系难回从前，但“尊重差异”本身，就是新的家庭相处方式。

卞灼则对未来家庭充满“多元期待”。他羡慕熊景明“大家族有根”，却也接受现代小家庭的“孤岛状态”，甚至畅想100年后的家庭形态：“核心是深层次的情感联系。”其实，这种期待在《翠湖》中已现端倪，影片不强调“传统家庭结构”，而是聚焦“无论如何都断不了的血缘纽带”。

袁长庚则以“包容”为未来定调。他反对“断亲”这种极端选择：“家庭里总有不可割舍的情感。”就像《翠湖》中未解决的冲突，《长辈的故事》中不同家族的差异，最终都因“包容”而共存。他从云南历史的“折壹性”延伸到家庭的“包容性”：“矛盾是随时而起随时而落的生活常态。正如昆明的天气，再热只要躲进树荫就会凉快，再冷走到太阳底下也会很快热起来。世界本身有其多样性，不必强行解决所有冲突，接纳差异就好。”他认为，未来家庭的关键，不是追求“完美形态”，而是学会“包容不同”。

从滇池风云到翠湖故事，从大家族到小家庭，两代“80后”的昆明叙事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内核：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家庭形态如何演变，那份深层次的情感联系永远是他们对抗遗忘、寻找归属的“时间纽带”。而这，或许就是昆明这座城市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集体记忆。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艺教科中心
文艺新观
办
邮 箱：ynwyp@126.com

书香云南

临沧的异质之美

——《临沧记》简评

何松

2024年5月，为“讲好临沧故事”，诗人、散文家雷平阳再次来到了临沧。其间，他在临沧八县（区）游历或做田野调查，两个多月后他回到了昆明，而此后，临沧的山山水水就陆续出现在《钟山》《长江文艺》等国内主流文学的刊物上。一年后，《临沧记》一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临沧记》以人类文化学的田野调查笔记为底色，融入了作者对临沧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日常生活的哲学性思考与诗意表达。雷平阳在临沧的写作是“在场的”，这个夏天，他像书中所写在云州寻回澜沧江走向的徐霞客一样，在临沧寻找一座山、一条河流、一棵茶树、一个茶人，查找一个词、一部民间史诗的出处和可能的现代性去向。在临沧，雷平阳一再发现不少陌生的地方和场景，竟如此熟悉，都仿佛曾经到过，见过。诗人相信，这之间必然有着某种神秘的内在联系，其实这正是诗人所达到的一种“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而这决定了他《临沧记》的写作，绝不是以一个“外乡都市人”的视角来看临沧。他与临沧这块土地及土地上的人们是共情的，一如他的诗歌中充满着悲悯与善意。

这是一本行走之书。在临沧采风期间，雷平阳每日早出晚归，风尘仆仆。遇到采访对象，他会从随身的亚麻布袋里拿出一个很厚的笔记本开始工作。他总是在不停地提问和记录。如他诗作《路遇》（诗集《豹寓言》）中所写：“空山中，偶然遇到的人/我会记下他们的姓名/以平等的视角，问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去哪里，为什么去/问了什么，答了什么/我会一个字也不删改地记录/还会记录他们的长相/表情、声音、衣着/携带了什么器物……”诗人问山中一个偶遇的人“你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去哪里，为什么去。”这些其实就是人类的终极问题，体现的正是作者的一种深邃的人文关怀。

这本书的写作是严谨的。传统印象中，诗人都是浪漫的，而事实上真正的现代诗人都是非常严谨的，他们所写的是具体、实在之物——“凡能说的都能说清楚”，他们追求用词的精准。雷平阳更追求“严谨”，他痴迷于具体而微小的细节“以其对应已存在的生命、时间、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临沧记》的写作过程中，对采访对象他必亲见、亲问，对一些场景都要亲自体验，而在遣词作文上更是力求精准，容不得半点的马虎。不仅用笔在写，为了记录的准确性，他还时常拿出相机拍照。而一些重要的场景，他更是录制成视频，以便后期写作时把采访的对象描述得更准确。他的采访扎实、观察细致、描述准确、真实可靠，因而他精准的文字具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雷平阳对采访对象的选择看似随意，实则有他的坚持，他对民间在野的、自然的，以及在历史的深处闪着幽暗微光的事物更感兴趣。他关注的是临沧的人文性、自然山水的野性，如他在诗集《豹寓言》中所说：“如果没有群山、河流、灵异的事实和有着古老生活习俗的族群作为我写作的摹本，我甚至会觉得写作对我而言是没有意义的。”诗人看似“随意”的事实构象，写出临沧的历史沧桑感和文化厚重感，因而他笔下所呈现的是一个带有雷平阳特质的奇诡、富丽、神秘的临沧。

这本书的写作中作者一直都“在场”。诗人以临沧大地为根基，捕捉这块土地上万物所交织的声音，这种“眼耳鼻舌身意”一直在场的写作具有着唤醒万物的力量。他贴着临沧大地的肌理来写：傣族民间叙事长诗《一百零一朵花》、白雾中的班别山、南本古茶园、临翔石洞寺、拉祜族创世史诗《杜帕密帕》及迁徙史诗《根古》，澜沧江上的普洱渡口、邦东大雪山、旅行家徐霞客、“茶树演化自然博物馆”白鹇山、梅子箐、老虎寨、德昂族创世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勐库大雪山上的茶祖……这些

事物在他笔下实现了“现实根系”与“超验羽翼”的精妙共生，坚实地贴着大地的有温度的写作，使地域性实现了跨越，因它触及到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地域性”也便找到了通往“世界性”的隐秘轨道，最终使临沧超越了地理坐标上的概念，而成为了通向人类精神共性的密码。

这本书为临沧这块土地上普通人的存在作记。书中出现了众多的临沧茶人，没有猎奇，所写都是他们的日常，呈现的是“存在”本身，如作者所言“是让那些沉默的、边缘的、被遮蔽的生命形态得以开显……呈现那些日常性中的尊严、困顿、欢愉与韧性。”即使是短暂采访、仅留有几行文字的人物，作者也能捕捉到他们存在的尊严与人性的光芒。

我之所以将书中所写物事和人罗列出来，是为了向《临沧记》这本书中所记录的临沧时空褶皱中的“不变之物”及《临沧记》这部著作表示致敬。

某种程度上雷平阳在《临沧记》中所写的的人和物事都是超越时空而存在的，它们像是一条河流里品质坚硬的石头，无论河上的泡沫如何涌动，这些石头还是这条河流最基础的载体，是历史长河中的“不变之物”。作者无意在转瞬即逝的“现象”上花心思，反而对这些“不变之物”充满着好奇。如他在书中写澜源岩画时所说：“无论时间的战争波及面有多大，多深，破坏掉的东西有多少，生活中值得纳入画面的事物其实也就那么一点几，昔在如此，现在也如此，不会有全面的取代和彻底的埋葬，‘不变’之变，变的是外形，不是骨头。”作者在临沧的时空褶皱中所摄取的一个个片段，正具有着这种“不变”的永恒性。

诗人雷平阳对临沧是有感情的。他说：“临沧是澜沧江文明最大的一个摇篮，同时，临沧还是一个山有水、有丰富多元文化的地方，这些文化很多被现代文明疏远了，现在是让我们转头回去寻找的时候了。在文化上，可以回到山寨去，回到古老的文化上去；在自然里，可

以回到桃花源一样的地方去，走到自己的记忆里面。这样的—一个地方，在世界上并不多。我们谈所谓的地愁，其实临沧就是一个巨大的乡愁。”临沧在诗人面前铺开了“一片由时间和文明碎片构成的新的原野”，这让他再次来到了临沧，写下了这本具有“异质之美”的《临沧记》。

深扎泥土的“在场性”与仰望星空的超越性写作，使《临沧记》一书具有了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诗学、茶学的多重价值和意义。《临沧记》中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敏锐的洞察力、深邃的人文思想及瑰丽的想象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别样的临沧，书中所呈现的一切，对我们自以为是熟悉临沧的人仍有着绝佳之感。如作者所言“在云南茶山中我行走了二十余年，孤旅或求证，茶主题之外，共同演绎的神话与传说、现实与梦境的交替现时、时间的遗迹与事物的复活，我都充满了好奇心，澜沧江的此岸与对岸俨然已经把我当成了前往银河的人间渡口。”而以濒临澜沧江而命名的临沧正是作者“人间渡口”中的重要一站。

这本书是文体的混搭，里面混搭的韵文体诗歌中有民族创世史诗、民歌、民谣、词、赋、古今中外的诗歌、作者创作的诗歌等；散文文体混搭的有田野调查笔记、访谈录、民间故事、传说、论文、卷首语、史料及文献索引、哲思笔记等，书中各种文体之间转换熟练、自然、妥帖，显现了作者的博学和对文本超强的掌控能力。

诗人游历临沧两个多月，写下了《临沧记》和《豹寓言》两部关于临沧的书，我以为出版时这两部书是可以做成一函的。散文《临沧记》衍生的诗歌《豹寓言》所显现出的文学价值同样也是无法替代的，诗作为文学的最高形式的原则在这里依然是成立的。某种程度上，《临沧记》倒成了诗集《豹寓言》产生的背景和注释。两部书无疑都已成为书写临沧的好作品。

云岭阅读

程海湖畔的红色基因

杨文江

程海湖安静地躺在金沙江自北向南东拐弯腹地，处于永胜县城的中心部位。一泓清澈的湖水，曾见证汉唐铁骑硝烟，“五月渡泸”“元跨革囊”拼死搏杀，“澜沧卫”亦兵亦农，杜文秀滇西揭竿引发他留烽火，解放军挺进大西南鏖战号角。作家芮体元（笔名浪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滇西北地区武装斗争为大背景，以发生在永胜程海湖畔的海腰铺事件为机枢，创作了一部名为《程海风云》的长篇小说。

作者以滇西北地区的武装斗争的史实为脉络，构思整部小说的篇章，据中共云南省地方史载，1947年底，中共云南省工委作出在全省开展武装斗争的部署，要求滇西、滇西北地区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争取用1年左右的时间发动武装斗争。并派黄平为特派员，领导开辟滇西工作。1948年1月至4月，省工委又派欧根（白族）、王以中（白族）、杨苏（白族）先后到剑川，加强滇西党组织的领导力量，相继建立鹤庆、乔后、沙溪、金江党支部，丽江、永胜建立民青（民主青年联盟）支部。随着剑川、丽江、永胜、鹤庆的农运和乔后的工运逐渐形成高潮，8月到9月，省工委增派大批干部到大理、维西、保山等县和藏区的前沿门户地区、小凉山彝族地区开展工作。中共永胜县工委从8月开始在河口、季官、三川等乡建立起地下军事小组。10月，通过党组织活动，永胜县工委委员彭纪（杨新纪）出任光华乡壮丁队长，掌握了部分武装。1949年2月，国民党永胜县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罗瑛和县长发生冲突。党组织抓住这个机会，将军事小组、壮丁队（大多数为农抗队员）组编为180余人枪的“两面武装”光华乡大队，大队长为彭纪。

在罗瑛武装围攻永胜县城之前，滇西工委了解到罗瑛的政治面貌，告知永胜县工委，罗瑛与共产党无任何关系，并指示：“两面武装”光华乡大队不接受罗瑛的任何命令，一切行动请示中共滇西工委，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可在南区开展游击活动，并及时与滇西工委联系。罗瑛等人觉察到光华乡大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遂“严加约束”，严令调往县城，预谋途中加以消灭。在罗瑛逼迫下，加之经验不足、缺乏警惕，2月10日，彭纪率光华乡大队向县城方向前进，宿营海腰铺时，突遭罗瑛派陈长策、王有元、关隆昌等部袭击，战士刘占北阵亡，90余人被俘，滇西工委交通员谢海量等31人被押往各地“示众”后杀害，随后众多家属受到株连和敲诈勒索。

小说以海腰铺事件始末为缘由，成功塑造了主人公彭武这一典型形象。彭武的原型即中共永胜县工委委员、光华乡大队长彭纪。小说用较多的笔墨描写了彭武出生在程海湖畔一个富裕殷实家庭，曾就读鹤庆高级中学，由于新婚妻子被诬致死，他长途跋涉到昆明找到

高中同学杨宏志（化名），在其鼓励下考上国民党军校，在教官加同学又是地下党员的杨宏志，以及地下党上级组织负责人费璎（化名）的教育引导下，思想进步很快，不久就加入了党组织，军校毕业后到国民党60军基层任职。由于彭武对国民党军队逐渐失去信心，遂离开部队回到家乡，通过乡里过年组织的比武大赛，以成绩第一得到乡长的青睐，被任命为壮丁队长。彭武通过四处寻找，终于与丽江党组织负责人杨宏志取得联系，并在壮丁队建立并发展党组织，与当地权贵进行不屈不挠的周旋和斗争。壮丁队在海腰铺被突袭受挫后，彭武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恢复党组织，壮大武装力量，持续领导永胜西山、顺州等地的武装反霸斗争。同时彭武积极主动做当地帮派权势人物的工作，争取他们弃暗投明，与党和人民站在同一立场，成功策反易少红（化名）带领近百人队伍投向游击队，接受边纵七支队整编，走上了光明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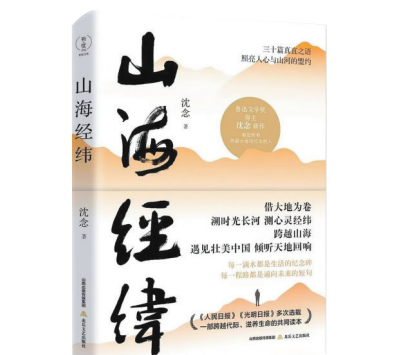
《程海风云》刻画了一系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以下小说中的人名皆为化名或虚构人物）。在民国晚期，滇西北乃至永胜县的社会政治情形，与当时国内形势大同小异，各种门阀、地霸、帮派、兵痞争权夺利，你方唱罢我登台，极尽蝇狗争斗之能事。据说永胜县当时就有八大司令，他们时而联合、时而倾轧、时而内讧、时而倒戈，光怪陆离凶态百出。小说描写了集国民党政府帮凶和地方帮派为一体的罗彪、易少红、王有武、关隆盛、陈长才、谭伟雄以及地方专员史荣等权势人物，再现了当时社会阴霾和政治腐败。同时，小说塑造了丽江党组织的负责人杨宏志，县中学地下党员刘云山，羊坪小凉山彝族头领余海新及公主阿丽尼，共产党派往彝区工作的胡兴，壮丁队张海、肖金国、李连昌、曾德贵等党的组织成员，还有彭武的父亲彭仁贵等人物形象。

小说讲述了生动传神的史事轶闻、爱情亲情、武装战斗等传说故事。就人物故事来说，根据情节的展开，彭武与阿丽尼的爱情、婚姻、家庭故事，一波三折高潮迭起，那些生离死别的生活场景，让人读后荡气回肠，留下怀想。

程海湖是永胜人民的母亲湖，以小说主人公彭武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了人民当家做主、建立新政权，在程海流域、程海湖畔，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传奇故事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缅怀铭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党组织在永胜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事迹公之于众，在海腰铺、河口小学等地建设了红色纪念馆和场馆，并确定为红色教育基地，小说《程海风云》的创作出版，为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一部重要读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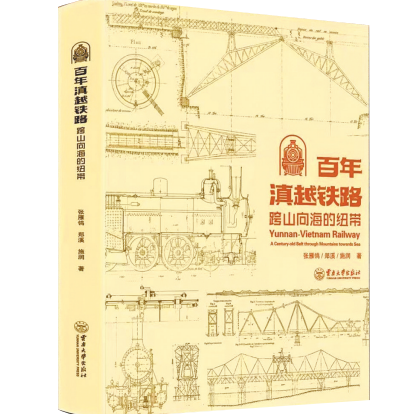
新书架

《山海经纬》出版发行



作家沈念的最新散文集《山海经纬》，近期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为“浩荡”“辽阔”“光芒”

《百年滇越铁路——跨山向海的纽带》出版发行



《百年滇越铁路——跨山向海的纽带》，近期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适逢滇

“漫长”四个篇章，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带领读者走进中华大地的山水之间，感受自然的壮美与人类的智慧，以庄重恳切的语言，呈现了独特的审美视角与精神体验，于“现在”的瞬间观照过去、体悟未来。正如作者在创作谈中所指出的：“山川湖海之间的足音，终将在某个清晨或黄昏，唤醒沉睡的记忆，让我得以看见大地的辽阔与生命的起伏。”

沈念，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多种奖项。出版作品多部，其中《大湖消息》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张雪飞

越铁路建成通车115周年。作为抗战期间的一条运输生命线，滇越铁路贡献卓著：1937年至1940年间，物资运量达130万吨，几乎与滇缅铁路、驼峰航线以及中印公路（含中印输油管）的总运量相当。此外，西南联大三分之二师生正是经由这条铁路抵达云南。本书的出版，既是对重要历史节点的致敬，也是首次对滇越铁路全线站点展开系统性摄影梳理的开创性尝试。

作为第一部整线路、全景式记录滇越铁路云南段与越南段历史与现状的中英双语地理摄影集，本书带领读者走进云南段深山河谷间的轨道，探访越南段鲜为人知的站点，追溯一座座桥梁与涵洞的前世今生，聆听一段段跨越山海的历史回响，将滇越铁路的建筑之美、空间之韵与意境之远展现得淋漓尽致。张雪飞